



關於日本教區 天主教主教的設立問題

劉小珊*

天主教1549年傳入日本，距離乘坐中國人帆船的葡萄牙人漂至九州南端的種子島七個年頭。1547年，犯殺人罪逃亡國外的日本人彌次郎和沙勿略的會面成為日本天主教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被稱作“輝煌第一頁”的事件。⁽¹⁾此後，耶穌會會士步其後塵陸續來到日本傳教，耶穌會巡視員范禮安前往日本視察傳教工作，更使得日本的傳教形勢一度達到頂峰。然日本教區常住主教的設立受到來自耶穌會上層人物的阻擾，及日本傳教客觀條件的影響，拖至1597年才得到解決。瑪律廷斯受派遣赴日擔任首任主教，他雖受羅馬教皇的任命，但前往已頒佈天主教驅逐令、嚴格控制傳教士自由出入的日本島國，仍遭到來自外部和內部的重重阻力。經過耶穌會士的斡旋，主教瑪律廷斯最終得以拜見豐臣秀吉，但此次拜見並未令日本統治者放棄實施驅逐令，主教亦被豐臣要求送回澳門。應該說日本教區主教的到任一開始就處於日本傳教事業危機四伏的時期，且不受日本統治者的真心歡迎，這或許就是日本教區主教設立受阻及主教長期居住澳門的重要原因。

天主教東傳日本的初始

1549年聖方濟各·沙勿略登上鹿兒島被認為是天主教進入日本的開端。1547年，沙勿略在視察印度、傳教香料群島之後回到馬六甲時，遇到畏罪潛逃的日本薩摩武士彌次郎，通過彌次郎以及另外三名日本人，沙勿略對尚未涉足的日本以及住在那裡的日本人開始充滿極大的興趣。沙勿略瞭解到去日本傳教極有希望，便將彌次郎送到印度的果阿接受宗教教育。1549年7月，沙勿略終於由彌次郎領路，來到其故鄉鹿兒島傳教，至此打開天主教傳教的通道。⁽²⁾《日本教會史》中有一個段落對此人作了如此介紹：

在當地(馬六甲)民眾中有一名叫彌次郎的日本男人，這個名字被很多書籍誤寫“Angero”。他為表明自己已遁世出家、獻身於拯救生靈，做做當地人把頭髮、鬍鬚都剃掉，改名為安西ANXEY，接受洗禮後又改名為保祿，從此被人們稱為“聖徒保祿”。是主派遣這個男人來令那個王國(日本)的人民逐漸相信我們的神聖教義。(……)這個彌次郎出生於位於日本最南端的薩摩國的首都——鹿兒島……這個男人年輕時候做過很多壞事，因為多行不義，彌次郎害怕自己會被打入他原信仰的宗教所宣揚的地獄，故受到良心譴責，希望自己最終能夠進入極樂世界。他抱着對極樂世界的憧憬，開始尋找贖罪和拯救自己的方法。⁽³⁾

* 劉小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日語教授、史學博士。研究方向：日本歷史、中日文化交流史、日本文化、日本漢學研究。



日本天文十八年(1549)8月15日(聖母昇天節)，沙勿略乘坐一艘中國人的帆船抵達薩摩的鹿兒島，同行的有兩名西班牙傳教士托雷斯(Cosme de Torres)和費爾南德斯(João Fernandes)、彌次郎及其弟約翰，以及僕人安東尼奧，一共六人。在此地，沙勿略得到領主島津貴久的盛情接待，並獲得傳教的許可。⁽⁴⁾沙勿略與當地的日本人廣泛接觸，他眼中的日本國民是傑出、優秀的，尊重武器、信賴武術，視名譽高於金錢，有着良好素質的人民。沙勿略通過書信將自己對日本人的印象向歐洲做了詳細的報告。沙勿略在鹿兒島召集群眾傳道之初，人們以為他宣講的天主教不過是佛教的一個派別，靜心聽講，從而獲得百餘名信徒。當人們明白真相——原來是排斥佛教的天主教後，引起佛教徒的強烈不滿，反抗情緒迫使島津貴久不得不禁止傳教。⁽⁵⁾沙勿略在鹿兒島傳教前後不滿一年。

1550年(日本天文十九年)，沙勿略帶領托雷斯和費爾南德斯轉向日本平戶。為向日本的統治者謀求在日本的合法傳教，沙勿略先後到了山口、堺市，其最終目標是京都。但當時的京都“應仁之亂”⁽⁶⁾後屢遭戰禍，且日本天皇的勢力衰落，傳教無望，沙勿略返回山口。山口是掌握中日勘合貿易⁽⁷⁾的日本大名大內義隆的居城，人口四萬，相當繁榮。沙勿略二次謁見大內義隆，遞交了果阿的印度總督和大主教的信簡，獻上鐘錶、鐵炮、綢緞、眼鏡、玻璃器皿等西洋禮物，遂得到傳教許可⁽⁸⁾，兩個月內受洗的信徒達五百人。後沙勿略又前往豐後的府內，得到領主大友義鎮(宗麟)的極力支持和保護，傳教進展順利，不久府內成為日本天主教傳播的一大中心。

受到沙勿略等人撰寫的關於日本和日本人的信函與報告的強烈震撼，許多西方傳教士懷揣向日本人傳授天主教的目的，抱着遠大期望和理想，不顧遙遠渡海的重重艱辛和危險來到日本，其中不乏年僅十幾歲的葡萄牙少年。如《日本基督教史》所記載：

天主教傳教士自沙勿略登上鹿兒島以後的七十餘年間，足跡踏遍日本幾乎所有的區域，例如，京都、九州、四國的伊予和土佐，形成了遍及日本整個地域的規模。16世紀末期，關東、東北地方在禁教迫害的狂風暴雨之中，天主教勢力仍從東北一直擴大到蝦夷地松前。⁽⁹⁾

1601年時日本天主教的信徒大約為三十萬人。⁽¹⁰⁾1602年到1613年的皈依者，僅耶穌會就大約64,500人，其他修會的皈依者數量不明。據報告推定1614年1月禁教令頒佈當時的天主教信徒概數為37萬人。由於日本統治者豐臣秀吉及後來的德川家康全日本範圍內禁教令的實施，天主教的大部分信徒或棄教，或遭迫害，大部分人表面上放棄信仰，很快又離開了天主教。(……)隨着禁教、迫害的加劇，天主教信徒們無奈祇能放棄信仰，信教人數急劇減少。同時，殉教者眾多，1614-1624年間有550名，且每年遞增，到1633年達到950人。另外，德川幕府時代，究竟再建、新築了多少教會，難以確認其數字。但是，禁教令之後，殘存於長崎鄰近的教會也於1620年全部遭到破壞，消失殆盡。⁽¹¹⁾

范禮安對日本主教設立的態度

沙勿略日本開教以來，很多優秀的耶穌會會士步其後塵陸續來到日本傳教，其中具有政治才能的人也不少，他們的努力使得傳教事業很快進入隆盛期，即使在禁教迫害期間也收到不小的成果，特別是在天主教傳教文化活動方面。其中，最為活躍、最具影響力的人物當屬1574年耶穌會派往遠東教區巡視的范禮安神父。他在前往日本途中曾因故停留澳門達十個月之久，在此期間，他對中國的傳教形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考察。⁽¹²⁾范禮安發現澳門的耶穌會傳教士對進入中國內地傳教因明朝政府的干涉幾乎不抱有信心，他認為要在中國推進傳教事業必須採取一種全新



的方式。他在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曾這樣寫道：

到目前為止，教會使用於任何地區的傳教方式都不能適用於中國。欲在中國傳教，傳教士必須嫻熟中文，不是地方方言，而是中國的智識階級所通用的官話，他們必須研習並適應中國的文化和風俗習慣，他們必須瞭解這一偉大而可敬的民族的歷史文化，並進一步與蒙受此文化薰陶的人們打成一片。⁽¹³⁾

同時，范禮安也認為當時在澳門的耶穌會傳教士無人有能力擔當起如此使命，於是，在1579年、1582年先後從印度果阿調遣意大利籍傳教士羅明堅和利瑪竇二人來到澳門，命令他們專門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研究中國風俗習慣，等待進入中國傳教的機會。范禮安本人則帶領一行人⁽¹⁴⁾繼續前往日本視察傳教工作，其間，他組織在日各地的耶穌會傳教士集會商議，重新規劃各地教區的佈局，創建耶穌會教育機構，積極聯絡各地天主教大名，組建天正少年遣歐使節團，使日本的傳教形勢達到頂峰狀態。1590年，在范禮安帶領“天正少年遣歐使節團”結束歐洲訪問返回日本，暨第二次巡視日本教區之際，他提拔已在耶穌會神學院經過系統學習和深造的葡萄牙人傳教士陸若漢作為自己的私人翻譯，從此，在葡萄牙傳教士的協助下，范禮安開始代表耶穌會在日本的各種與傳教、貿易有關的外交事務，斡旋於耶穌會上層人物和日本統治者之間。

當時日本尚未設立常住主教，故要晉鐸為神父的人必須回到澳門。⁽¹⁵⁾ 澳門的第一任主教卡內洛（Melchior Carneiro）是一位聖人般的人物，到1580年辭去職務為止的十四年間，一直擔任主教的職務。繼任者是1581年上任的雷奧納多德薩（Leonardo），給當時葡萄牙傳教士陸若漢等人舉行晉鐸儀式的就是這位主教的臨時代理人瑪律廷斯（Martins）。⁽¹⁶⁾ 為提拔神父而專程將傳教士送回澳門參加儀式存在諸多不便。首先，海上航行

就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1582年2月20日隨范禮安前往澳門參加晉鐸儀式的莫萊拉（Moreira）、迪亞斯（Álvaro Dias）二人返回途中於臺灣海面遭遇危險，拖延至翌年的7月25日才回到長崎。二者，影響耶穌會傳教工作的正常開展。由於航海的危險、物質的缺乏等諸多因素，傳教士們常常會因為參加短短幾個小時的晉鐸儀式離開日本十幾個月，甚至幾年之久，給本來就人手不足的日本傳教工作帶來加倍的緊張和忙亂。日本教區主教的設立迫在眉睫，但此問題因為受到來自耶穌會上層人物的阻擾以及客觀條件的影響，一直久拖至1597年才終於得到解決。

早在1580年范禮安第一次視察日本召開的耶穌會協調會上，就有菲格萊多（Figueiredo）等人指出任命一位常駐日本主教的必要性：

日本有大約15萬人的天主教徒，信徒已經達到如此多的數量，按常識也應該任命一位統領全域的主教。如果主教一直定不下來，負責日本傳教事務的耶穌會就會受到指責。為了讓信徒們接受信仰的真諦；為了提拔歐洲人或者日本人的神父候選人；為了減少日本教士前往澳門接受提拔過程中浪費的時間和面臨的風險，日本的主教是必需的。⁽¹⁷⁾

但是，范禮安舉出幾點理由反對任命主教：

第一，即使給日本的教會任命了主教，也沒有能力給予跟主教地位相當的待遇。

第二，擔任主教的人均為上年紀的教士，很難適應日本的風俗習慣。

第三，即使耶穌會會士當上主教，如果跟耶穌會的上層意見不統一，可能會對傳教工作產生影響。⁽¹⁸⁾

范禮安強調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三點，如果托鉢修道會——多明我會（Dominican）和方濟各會（Francisco）來日本參加傳教活動，就需要一個統領整個日本教會的主教。不任命主教的話，就有理由不接受除耶穌會以外的其他修道會傳教士



來日本。范禮安意欲拒絕其他修道會進入日本，故極力反對任命主教，但最終范禮安的意見被會議否定。

日本教區第一任主教瑪律廷斯

1580年的耶穌會會議後，教皇希克斯托斯（Sixtus）五世於日本府內設立教區。⁽¹⁹⁾ 印度耶穌會管區長瑪律廷斯（Martins）接替1588年在里斯本接受任命、卻因熱病死於赴任途中的莫拉埃斯（Moraes）成為日本第一任主教。與他同行的是塞爾凱拉（Cerqueira）——教皇出於保險的考慮，同時任命塞爾凱拉為主教助理，並賦予他主教繼任權。瑪律廷斯主教1596年到達府內教區後便常住在日本天主教的中心地長崎。⁽²⁰⁾ 瑪律廷斯是位歷經諸多變故、經歷豐富的著名傳教士，隨國王遠征非洲。在戰場上成為俘虜後又被贖回，赴印度傳教途中海上遇風暴，擔任印度耶穌教的管區長，在果阿被提陞為主教。⁽²¹⁾ 與此相反，塞爾凱拉則是埃博拉大學的一位神學教授，一直過着平靜的學者生活，在出發來東方之前的1593年11月才在里斯本被提拔為主教助理。⁽²²⁾ 兩人的經歷形成鮮明對照。

瑪律廷斯雖受羅馬教皇的任命成為日本教區的主教，但要前往已頒佈天主教驅逐令、嚴格控制傳教士自由出入的日本島國，單憑日本教會的最高職位——主教的身份或許很難獲得允許。對此，庫帕稱：

瑪律廷斯決定做做范禮安，以外交官身份進入日本。於是，瑪律廷斯於1593年4月離開果阿之前，又被賦予梅內瑞斯（Meneses）總督特使的身份。羅德理格斯（陸若漢）在澳門參加晉陞儀式時，瑪律廷斯正在澳門等待出發去日本。⁽²³⁾

1596年7月21日，新晉鐸為神父的葡萄牙傳教士陸若漢等六人隨同瑪律廷斯主教乘坐去日本的

菲格萊多（Figueiredo）船離開澳門。⁽²⁴⁾ 對於主教的上任，各方面似乎頗感擔心：澳門的天主教信徒當中有人懷疑主教能否應付日本的傳教形勢——日本仍然籠罩在豐臣秀吉驅逐令的陰影之下；耶穌會士擔心主教是否會維護本會的利益——據說身為耶穌會會士的瑪律廷斯對於耶穌會不僅無愛心，甚至帶有敵意；范禮安擔心自己今後很難同瑪律廷斯合作——瑪律廷斯個性偏激、易動怒，常聲稱自己必須服從的祇有教皇和國王。⁽²⁵⁾ 相比之下，主教助理塞爾凱拉卻心地善良，勤勤懇懇，受到廣泛的稱讚。派里斯（Pires）稱：“即使拿他（塞爾凱拉）跟1583年去世的、為教會奉獻一生的卡爾內羅（Carneiro）相比較，也毫不遜色。”⁽²⁶⁾

預示着日本教會的前途充滿危機的航行，果然不平靜。主教一行人赴日途中遭到風暴襲擊，歷經艱難，直到8月13日才到達長崎港口的沙洲。此時，日本的信徒們已做好充分的準備，衷心歡迎第一位主教的到來，戈梅斯率耶穌會士乘小船到沙洲港口迎接主教一行人。⁽²⁷⁾

瑪律廷斯受到熱情的歡迎也非常感動，到日本不到一個月，他就改變了對耶穌會會士的印象，並跟他們合作得很好。葡萄牙人耶穌會會士盧塞納在寫給羅馬的信中稱：

主教認識到在澳門時的工作方式太過於形式化，所以沒跟耶穌會會士搞好關係。來日本之後，發現這些人（耶穌會士）都很謙虛、豪爽。因此，在兩個月當中，主教向四千名信徒說教，傳授天主教信仰的真諦，每天忙於工作，盡到了祇有主教才能盡到的職責。⁽²⁸⁾

不過，在澳門同樣受到范禮安歡迎的瑪律廷斯仍固執地表示：

由於觀點不同和管理權的衝突，自己和范禮安的對立關係永遠也不會改變。⁽²⁹⁾



日本教區主教拜會豐臣秀吉

1596年，日本教區開始為瑪律廷斯主教謁見豐臣秀吉作準備，當時日本面臨即將出兵朝鮮並忙於準備歡迎中國使節團的關鍵時刻。由小西行長負責接待主教的工作，其部下寺澤奉行具體安排瑪律廷斯跟豐臣秀吉會面的行程。小西行長本人還專程從名古屋坐船到長崎跟主教去見面，商談有關拜見豐臣秀吉事宜，小西不僅出謀劃策，還向主教贈送大米和小麥各兩百石。⁽³⁰⁾ 日本教區方面負責此項工作的是剛獲得神父資格、回到長崎的陸若漢傳教士，他的任務則是向豐臣秀吉傳達新任主教的旨意。他在1593年建成的豪華的伏見城堡同關係甚密的官員們反復協商，得到盡早帶領瑪律廷斯主教來京城的建議，以及具體拜見方式的指導。不久，瑪律廷斯主教在陸若漢的指引下，帶着總督的書信和價值五百兩銀子的禮品乘船前往京城。長崎奉行寺澤和陸若漢乘坐另一條船同時前往，可途中突發的撞船事故給此次訪問投下了陰影。庫帕轉述寺澤奉行的話說：

這一事件是一個不祥的預兆。(……) 瑪律廷斯的訪問也許要失敗。⁽³¹⁾

正如人們預料的那樣，瑪律廷斯主教11月的京都拜訪確實碰到一個不合適的時期——9月發生的五畿內一帶大地震——京城裡兩年前剛建起的大佛像倒塌，皇宮崩潰，許多重臣的房屋都被破壞，很多人被活埋，豐臣秀吉抱着年幼的兒子好不容易死裡逃生，而且，地震引起的巨大海嘯給海岸地區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³²⁾ 10月，中國使節團帶來一封明朝皇帝充滿忠告言辭、口氣傲慢的書信。⁽³³⁾ 弗洛伊斯在一份英文資料中描述當時秀吉看完這封信時的情形，他稱：

秀吉氣得發瘋，不能自己。他口吐白沫，一邊怒罵一邊扯自己的頭髮，直到七竅生煙，冷汗濕透全身。⁽³⁴⁾

瑪律廷斯主教到達伏見城堡後，首先遭遇的是豐臣秀吉派來的前田玄以等官員的一番責問：為何葡印總督沒有及時回贈豐臣秀吉的禮品？主教作了簡單的辯解。接着，隨同謁見的傳教士翻譯親自來到豐臣秀吉御前，和前田一同極力說明總督回贈禮品遲緩的原因，秀吉的心情終於好轉，同意接見主教，並派官員清點瑪律廷斯帶來的禮品。豐臣還向主教的隨行翻譯詢問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沖上四國海岸的西班牙船舶是否從菲律賓來；另一個則是墨西哥和菲律賓是否跟葡萄牙和印度一樣都由一個國王統治。傳教士翻譯認真地向秀吉報告說：那艘船是從菲律賓開往墨西哥的途中進水而沉沒的，菲律賓、墨西哥、印度和葡萄牙四國當時都在一個國王的管轄下。豐臣秀吉聽完翻譯的報告感到很滿意，似乎平靜了許多。⁽³⁵⁾

主教瑪律廷斯終於得以拜見秀吉。這次拜見，雖不像范禮安來訪時那樣威風而豪華，但據二十年後隨行傳教士陸若漢的回憶稱：

秀吉比起前一次表現出更加熱情的態度。秀吉對（因受地震影響）不能夠舉行跟來賓地位相當的招待表示歉意，但保證說，等到修繕完畢，一定要把他們接到城堡內。⁽³⁶⁾

瑪律廷斯主教在京城逗留三週，向五畿內地區約兩百名天主教徒說教，傳授信仰的真諦。

瑪律廷斯主教的訪問團此次拜訪不能說取得了成功，但能得到豐臣秀吉的知遇，新主教甚至充滿樂觀地期待：豐臣在其日本統治期間允許耶穌會教會重新開始在日本的傳教工作。但此次拜見並沒有令態度熱情的豐臣秀吉放棄實施驅逐令，而且，在主教還沒回到長崎期間，豐臣便向寺澤奉行下達指示——要把新主教送回澳門去。⁽³⁷⁾ 應該說日本新主教的到任一開始就處於日本傳教事業危機四伏的時期，且不受日本統治者的真心歡迎。



結語

縱觀天主教在日本近世約百年的傳播歷史，它大致經歷了三個時期：1549-1570年，是天主教開始傳入日本、為日本人民所接受的發展時期；1570-1587年，是天主教在日本飛速發展的鼎盛時期；1587-1638年，是天主教受到統治者的迫害而趨向消亡的衰落時期。天主教之所以能夠在日本傳播、逐漸被日本人民所接受，且興旺發展十七年，其首要原因當屬耶穌會自上而下式的傳教方式——他們以貿易利益為誘餌，吸引戰國時代群雄割據、急需戰略物資和增加財富大名們信教。當時日本與明朝的勘合貿易因為倭寇的擾亂而斷絕，祇有依靠南蠻貿易維持經濟，而接受天主教是獲得南蠻貿易的先決條件。其次是傳教士自身的品行和學識——當時的耶穌會成員充滿朝氣，堅守清貧、貞潔、服從、獻身於傳教事業。他們絕大部分是道德高尚、學問淵博的人，與墨守成規、貪圖安逸的佛教僧侶形成鮮明的對比。再者是傳教方式的日本化——日本耶穌會強調傳教士必須先學習日語和日本的思想文化風俗，穿和服，不吃肉，盡量迎合日本人的風俗習慣；大部分教堂使用的是原先的佛寺，僅僅更換裡面的佛像、祭壇等；傳教用語也盡量借用佛教，因此頗深入人心。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天主教還廣泛開辦社會慈善事業，如設立醫院⁽³⁸⁾、孤兒院、賑濟災民、創辦學校等，收到很好的效果。同時，天主教的傳播，也帶來了哲學、法學、論理學、法律學、神學等歐洲的哲學思想。這些思想通過耶穌會創辦的神學院被傳入日本人的心中。

當然，天主教思想也有與日本封建思想存在對立的地方。日本封建社會的一大重要支柱是主從關係，主君對家臣有絕對權威，家臣絕對服從主君，對反叛的家臣的處罰一般是賜予切腹。但是天主教認為生命是神的恩賜，自殺是對神褻瀆的犯罪行為。因此，信仰天主教的武士公開拒絕切腹，破壞了嚴格的主從制度，動搖了封建社會

的支柱。另外，在倫理道德方面，天主教所帶來的思想大多與日本的封建理論格格不入。天主教主張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重視貞節反對淫亂，這嚴重地破壞了男尊女卑、一夫多妻制的日本封建秩序。天主教強調個人的人格和家庭的神聖，這與日本的抹殺人格、家庭附屬國家的封建準則相對立。天主教還主張兄弟之間平等友愛，這與封建的長子繼承制度相違背。可以說，天主教思想明顯威脅到日本封建社會的統治，它一定會被統治階級加以破壞和排擠。因此，天主教在日本傳播的近百年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時間是在為生存而艱難掙扎。這或許就是日本教區主教設立受阻及主教長期居住澳門的重要原因。

毋庸置疑，天主教在日本的傳播給戰國時代的日本帶來極大的變化，使日本從一個國家變成了世界大家庭的一部分。南蠻文化的傳入給日本的社會文化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進而影響到經濟、軍事、政治等方方面面。南蠻貿易則是天主教帶來的附屬品，它推動了江戶初期日本經濟的發展，南蠻貿易帶來了歐洲先進的武器裝備，其代表性物品就是鐵炮。鐵炮的傳入大大改變了日本傳統的作戰方式，同時使得擁有鐵炮這一先進武器的大名強盛起來。軍事的發展使得許多親近天主教的大名逐漸掌握了政權，也大大影響了日本當時的政治格局。也許正是由於這些威脅，導致了天主教在日本的最終消亡。

天主教傳教士的到來，讓日本人有機會看到歐洲人，得以接觸歐洲文化，接踵而來的是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美國人和法國人。從此，日本開始了與西方各國，以及歐洲文化的交流。

【註】

- (1) [日] 海老澤有道著：《日本キリスタン史》，頁26，塙書房，1990年。
- (2) 彌次郎後來受洗，教名為保羅，成為日本最早的天主教徒。
- (3) 陸若漢著，土井忠生等譯註：《日本教會史》下第六章，頁295。
- (4) 島津貴久支持沙勿略神父傳教的目的是希望借助外力加強自身力量。他曾處心積慮阻止神父前往京都朝見天皇，目的就在於盡可能挽留他，並從傳教士身上得到



- 所需的物品，以免他人捷足先登。——[日]海老澤有道著：《日本基督教史》（《日本キリスト教史》）頁6，日本基督教團出版局，1970年。
- (5) 島津貴久非常清楚傳教士所能帶給他的利益，也知道怎樣才能獲得這些利益。他從不隱瞞他的想法，至少已用行動提醒神父，招來葡萄牙商船不僅是他的真誠願望，而且也是神父用來換取傳教許可的籌碼。最後由於前往平戶的沙勿略神父並沒有為領主帶來他與葡萄牙商人的交易，致使島津貴久在希望破滅後立即翻臉。——海老澤有道著：《日本基督教史》頁6。
- (6) 圍繞將軍繼承權問題展開的將軍足利義政和其弟足利義視兩派的爭鬥，全國的武將權衡自己的利害關係，各自呼應，戰亂波及全國。這一年正是應仁元年(1467)史稱應仁之亂。——海老澤有道著：《日本基督教史》頁6。
- (7) “勘合貿易”——採用鄧鐘所撰寫《籌海重編》中的解釋是，勘合貿易(又稱朝貢貿易)是指海外諸國與明政府間進行的以朝貢為名的有限制的貿易。明政府明文規定：“貢船者，法所許，市舶之所司，乃貿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許，市舶之所不經，乃貿易之所私也。”
- (8) 現在山口市豎立有傳教紀念碑。
- (9) 海老澤有道著：《日本基督教史》頁7。
- (10) 范禮安1601年10月16日的信函，Jap. Sin. 14, I, 81-82v——引自海老澤有道著：《日本基督教史》頁7。
- (11) 海老澤有道著：《日本基督教史》。
- (12) 當時的澳門已經成為葡萄牙在東方的貿易基地，成為西方人在中國的一個落腳點，為1565年耶穌會在澳門建立自己的會院提供了良好的機會。但是在中國傳教問題上，耶穌會傳教士最初並沒有找到適當的方法，再加上中國明朝當局閉關自守的政策和排外的心理，致使耶穌會的傳教活動一直未能超過澳門的範圍。——海老澤有道著：《日本キリスト教史》頁26。
- (13) 賈天佑著：《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頁9，載羅光主編《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香港真理學會、徽祥出版社、光啟出版社聯合出版，1966年。
- (14) 如第二章所述，陸若漢很可能就在這一行人當中，也就是說陸在去日本之前曾途經澳門，當時他不過一名普通的十幾歲葡萄牙少年跟隨來日本，故沒有留下任何陸在澳門的有關記載。
- (15) 教皇葛列格里(Gregory)十三世於1575年設立澳門主教管區，負責掌管中國和日本的教會事務。理論上，澳門教區長有對日本教會的管轄權，但實際上，這種管轄權從沒有被真正履行過——前揭《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羅馬52a的133卷。
- (16) 但後來也有資料(Maxia，澳門1596年6月15日《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羅馬13(1)第29頁)說是塞爾凱拉(Cerqueira)給這六人舉行晉陞儀式，這也許是記錄或者記憶的一個錯誤吧。
- (17) 1580年 consulta 的記錄，《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羅馬2第5至7卷和45至48卷。
- (18) [葡]范禮安，《附加手稿系列》大英博物館9852和接着的第16卷。
- (19) 因為該領主大友宗麟一直很優待和照顧天主教傳教士，作為對其的感謝，教皇將教區設置於此地。
- (20) 因為此原因相繼赴任的兩名主教在給歐洲寫信簽名時都寫的長崎主教，而不是府內主教。
- (21) 瑪律廷斯曾經隨年輕的理想家塞巴斯蒂安國王遠征非洲。1578年8月，在阿爾卡薩爾吉維(Alcazarquivir)戰敗，被伊斯蘭教徒抓。後來由於西班牙的菲利浦二世將他贖回，得以自由。1583年，作為傳教士前往印度的途中，在莫三比克海峽，他乘坐的聖地牙哥號被風浪擊碎，瑪律廷斯及另外六個人被沖上海岸，其中四個人因為身體虛弱而死。瑪律廷斯最終到達印度，擔任印度耶穌會的管區長，直到1592年在果阿被提拔為主教。
- (22) (23) (25) (30) (31) (36) (37) 邁克爾·庫帕著，松本たま譯：《通辭-ロドリゲス》第5章，頁84；頁85；頁86；頁89；頁91；頁93；頁93。
- (24) [葡]Martins，1594年1月6日《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羅馬12(1b)第156卷。
- (26) 前揭Pires，《耶穌教—亞洲系列》，阿儒達圖書館，里斯本49-V-3，第2卷。
- (27) [葡]弗洛伊斯，長崎1596年7月3日《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羅馬52第180卷。
- (28) [葡]Martins，長崎1596年5月23日《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羅馬13(1)第16頁。
- (29) 瑪律廷斯曾明確地向戈梅斯和巴範濟表示，如果范禮安回到日本，他將馬上離開，因為他們兩人不可能在一起。此後，他還補充說，如果范禮安還帶着塞爾凱拉來的話，他不僅會離開，還會馬上向國王報告——前揭 Gomez，長崎1596年5月18日，《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羅馬13(1)頁8。
- (32) 前揭參見弗洛伊斯，長崎1596年7月28日，《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
- (33) 在這封信中，明朝皇帝在承認豐臣秀吉是日本統治者的同時，明確要求他好好治理中國的小小領屬國日本。
- (34) [葡]弗洛伊斯的原稿，《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羅馬52，頁248。
- (35) 前揭 Martins，澳門1597年6月17日，《附加手稿系列》大英博物館9858第2卷。
- (38) 耶穌會最早進行的科學活動就是創辦醫療事業。最初開設山口救貧院，後因為陶晴賢的叛亂被燒燬。1556年阿爾梅達在府內設立了孤兒院，得到好評，後又將兩幢耶穌會的住宅改建為施療院，分為內科、外科、兒科和癲風病專科，阿爾梅達任主治醫師。他出生於里斯本，1548年醫科大學畢業並取得外科醫生開業證書，有較高的醫療水準。之後由於教會的大發展，在各地都出現了醫院，並很快形成了有特異傳統的南蠻醫學，特別是南蠻外科，出現了栗崎道喜、中條帶刀、阪本養安等著名的西醫。現存最古的南蠻派醫書是1619年(元和五年)山本玄仙的《萬外集要》。——海老澤有道著：《日本基督教史》頁13。